

中西部是“最大回旋余地”的积极信号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日前召开的促进西部发展和扶贫开发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

这向市场透露怎样的积极信号呢?首先,明确中西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表明在对待投资手段上,我国将会保持科学、全面、客观的态度,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相对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当前,由于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现状,市场对投资特别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有些心理扭曲,认为一旦启动投资,必然会使经济重回以投资为主导的老路,阻碍正在深入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这种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要彻底摆脱投资的促进作用,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对于像我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合理的经济结构应该是投资、消费、出口等保持恰当比例、有机结合,不能过于倚重或者彻底放弃其中的任何一种增长动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的消费和出口经济都非常发达,但国内制造业的投资日趋弱化,成为导致其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大的很多国家和经济体来说,都应保持经济增长动力的平衡,而不应矫枉过正。

其次,会议透露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更多向西部地区倾斜,表明在合理运用投资手段上,将更加强调改善投资的结构和方向。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仍然匮乏,公共服务水平尚未达到基本需求。比如,近期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暴露出一些地方道路交通、房屋建设、卫生医疗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薄弱环节。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一领域加大投资是在还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欠账。可以预见,对这些地区相关领域的投资,将是未来一个重要的方向。同时,这样的投资不仅有助于改善当地基础设施落后、生活水平落后的状况,缩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长远来讲,还有利于这些地区百姓解决后顾之忧,提高其消费水平和能力。

再次,明确中西部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表明通过发展中西部经济,有助于化解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行业存在的严重产能过剩,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换来更大空间和更多时间。发展中西部经济,加大中西部铁路、水利水电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吸纳一部分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提高资源的合理利用水平。这将有助于缓解这些行业持续严重亏损的状况,减少对经济增长放缓造成的压力,并稳定相关行业工人的就业、收入等问题。当然,这种通过适当提高需求缓解产能过剩的方法,需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切不可向市场传递错误的信号,引发企业又一轮盲目投资扩大产能,从而进一步扭曲市场运行规律。

最后,明确中西部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回旋余地,表明中西部可以通过更好地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环境友好型产业的转移,改善我国区域、城乡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的局面。通过合理布局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保持投资与出口消费、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业和农业等之间的合理结构,并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地方财政收支、就业等缓压。总之,强调中西部在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格局中的优先位置,有助于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统一,有助于促进社会公正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一过程中也将出台大量改革举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

李子丁

一次街头凶杀对一座城市的伤害

8月25日晚9点半左右,成都一环路北四段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一名男子先在42路公交车上用刀捅伤多人,随后从公交车下来砍伤多名路人,十多人被砍伤,其中最小的仅10岁,4人因伤太重已宣告不治身亡。目前嫌犯已被警方抓获,行凶者41岁,消息称,其是四川金堂县人,常年以务工为生。

从事发当晚到我写稿的时刻,在微信、电话和短信里,亲戚朋友和熟人们,纷纷在传递着这样一个可怕的消息,大家相互询问着“你没事吧”,或感叹“太可怕了,都不敢上街了”,恐惧与恐怖的表情,溢于言表。这是除了死伤的15人之外,那位可怜的杀人者给这座恬静的城市带来的又一种伤害。“曹家巷”“马鞍山”“一环路北四段”“42路公交车”,这些熟悉词汇的另一种意味,是可怕的悲剧其实离我们如此之近,近得让每个人都有一种险过剃头的感觉。这些地方,平时给人的感觉,是卖着鲜花、摆着各种小吃的小店,永远茶客和酒客盈门的休闲地段,与一场惨烈的杀戮,相隔岂止是千里万里?而是在最没有料到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恶毒杀手,对15个无辜的市民发起了一场来路狂奔式的杀戮,伤者多数是腹和胸等重要部位中刀,入刀方式是最严重的“捅”。是什么样的仇恨,让这个凶徒将素不相识的路人甲乙丙,全部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一刀一个,刀刀致命?

这起凶杀案,给成都这座散淡悠闲的城市,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伤口,说一座城市因而受伤,应该不算是夸张的表述。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优雅与淡定,如美女的脸上被划上一道血痕般被破坏;15个受伤者和他们的家庭,被这天而而降的无妄之灾击碎;更多人心中安宁与美好,顿时如瓷器般碎裂一地;公交车、街边花园甚至路边的饮品小店,不再像以往那样平静而安详,而代之以一路危机四伏的恐惧感。这些,都是那个可恨的杀手带给这座城市的直接伤害、间接伤害、明伤和暗伤。

这种悲剧,并非成都独有。其实,在公交大火烧过的厦门,公交车杀人案发生的安阳,孕妇诱杀小护士的佳木斯,每次惨烈的案件发生后,整个城市都陷入了一种受伤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既包括了人们对出门或乘坐公共交通的恐惧感,也包含了人们对发生此类悲剧的愤怒和无力改变事态结果的无奈感;这种刺激的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但值得欣慰的是,人们在悲伤和恐惧之后,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关于爱的信仰,无论是在厦门还是安阳,无论是在佳木斯还是成都,人们在短暂惊呼之后,第一个反应是谴责凶徒、反思公共安全以及社会对绝望的弱势者的态度等,在悲剧发生地和网络上,我们看到了各种鲜花与蜡烛,我们看到人们真诚的悲伤难过与恐惧。

你无法低估这座城市经历过大地震并见过太多苦难的城市,即使在8月25日那个血雨腥风的夜晚,人们救助伤员,与歹徒搏斗,协助警方成功抓获凶犯,都显示出这座城市因灾难背后并不脆弱的意思。大家在惊叹之余,不会不坐公交车,大家也不会不出门散步,即使在悲痛的一环路北四段,人们也不会因恐惧而掩面而过,因为所有人都相信,举刀向无辜者的懦夫,在这座城市里是极个别的,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极端者,而放弃我们的生活,我们坚信,爱与正义必然是这样的主流。

这个惨烈的个案,同时还提醒我们,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并不美好的东西存在,我们要正视它,面对它,改变它。鲜血激发的,不应该是仇恨和恐惧,而是对爱与仁慈的进一步信仰。今夜,我将上街,在逝者的血痕旁,放上蜡烛与花。今夜,我们将以从容的步伐,告诉世界,我们依然相信爱,而相信爱的心,是永远不败的!

曾颖

当干部不能只会抓经济

一位专家曾这么说过,新中国头30年是解决“挨打”问题,第二个30年是解决“挨饿”问题,今后30年要解决“挨骂”问题。虽是一种比喻,却耐人寻味。且不说,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在国际上遭受着更加严苛的审视,也面临着不同意识形态的龃龉较量,使“挨骂”在所难免;单从国内来说,许多干部可能都有类似感慨:经济发达了,批评声却比以前更多了;埋头苦干着,有时却得不到理解认同,一些群众甚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出现这种情况,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增多的因素,有干部工作不到位的原因,也有群众水涨船高的期待。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经常被忽略,那就是对一些干部只重视搞经济建设,对意识形态工作却不想做,不愿做,不会做。有的片面理解“行胜于言”,将宣传思想工作视为可有可无的点缀;有的奉行明哲保身之道,害怕说错话、表错态而保持沉默,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忽略能力提升,对新的舆论环境一片茫然,躲媒体、怕网络、躲舆论。

不善于表达自己,就会“被表达”;不主动回应诉求,就是放弃话语权。这些年来,因为表达不当而招来的批评质疑,因为信息不畅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因为缺少沟通而导致的误解对立,无不说明,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如果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尤其在今天,国际上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内人们思想互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如果意识形态工作还停留在原地,不仅要吃大亏,甚至还要犯大错。

改革开放至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基本共识。但也要看到,治国理政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把领导职责简化为“抓经济”,把执政兴国等同于“惠民”,就会走入另外一个误区。历史和现实反复说明,经济建设做得再好,也不能一俊遮百丑。试想,如果经济发展逻辑和意识

形态宣传“两张皮”,说服力从何而来?人心凝聚和政治整合只靠经济利益,持久性如何实现?如果跟群众连话都说不上,又谈何做群众工作?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干部说起经济工作来头头是道,但谈到意识形态工作就枯燥乏味,不是照抄照搬的老一套,就是空洞无物的旧说辞。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谈到“本领恐慌”时,曾经举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如今,面对迅猛发展的新媒体,面对各阶层不断提高的表达能力,领导干部如何真正跟上时代的脚步,如何避免新的“本领恐慌”?

在这个意义上,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抓宣传思想工作。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两把刷子,一个道理能深入浅出地阐释清楚,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同群众打成一片,讲的话群众喜欢听,写的文章群众喜欢看,工作才会主动,才能得心应手。只有善于在众声喧哗中明辨主流支流,善于从百家争鸣中把握真实民意,把重大决策部署宣传到位,把涉及群众利益的政策解释到位,把群众关注的热点引导到位,才能真正做到答疑解惑、疏导情绪、平衡心理,从而实现党和政府“无形资产”的增值。

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我们党来说,能不能打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能不能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已经说明了;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继续保持党的思想宣传优势,需要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继续做出回答。

人文



据报道,针对大量虚假广告充斥电视节目的情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初审稿与二审稿均强化了虚假广告发布者的连带责任。这无疑为所有愿意替商家做产品广告的名星们敲响了警钟:接广告活时,请睁开眼睛看个仔细,辨清真假优劣后再作决定。 吴之如 文/画

在家上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有多少?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统计,目前正在实践在家上学的孩子,约为2000人。其实,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总量,目前正在实践或者对在家上学感兴趣的群体数量真的不算多。但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无论你不接受,总是有它存在的理由。在家上学还是带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家长为何要带孩子逃离学校?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家庭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认为统一的、流水线式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孩子缺乏个性,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弱,更希望自己个性化地教育方式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发育。至于这些家庭的选择是对是错,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为孩子肩头日渐沉重的书包减负也是这些家庭选择在家上学的原因之一。在当前应试教育体制的改革方案。然而,遗憾的是其中的第五点,即“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普遍反弹,这不能不说是方案中的一个明显的瑕疵。

于是,便有媒体采访了“清华方案”的设计团队,并以“延迟领养老金非延迟退休”为题进行了报道。如果死抠概念,“领取养老金”和“退休”当然是两回事。但是,对于大多数退休后再养老金将是维持生活唯一经济来源的劳动者,“领取养老金”和“退休”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再者,在中国,这样的劳动者又有多少呢?

上述报道中以美国为例,说明了劳动者是可以先退休,然后过几年再领联邦养老金的。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是,美国有一个401K的补充养老金计划。按清华团队的说法,美国人59.5岁退休,65岁领取联邦养老金,其间的空白,可以由401K来填补。但是,有资料表明,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三支柱”计划,除了联邦公共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之外,还有私人养老金,即企业养老金(401K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IRA计划);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宣布一个养老金改革的计划,从1983年到2017年,在35年中,逐步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延迟到67岁。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计划实施时,401K和IRA这两个计划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所以可以“填补空白”。

如今“清华方案”提出,“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问题在于,这些被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女性职工和居民,他们的401K或IRA在哪里?其实,这种不讲理的政策有点像“协保”——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其特点是“不管当前生活,只管退休养老”,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女性职工有相当一部分正在享受这种“待遇”。现在眼看退休年龄将到,要“苦出头”了,然而政策又

显示:目前多数小学生每天完成作业需要1~2个小时;从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间,小学生近视率翻了一番。没有健康的未来不是美好的未来。日前,教育部公开《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小学不留书面家庭作业等,正是对喊了多年的“减负”有了一个强制性规定。

在线教育等新兴教学手段的兴起也为在家上学提供了技术支持。其实在家上学的孩子并不都是家长教;有人说在家上学不意味着全部自学,可以有多种途径,在线教育就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事实上,通过借助教育产业化资源对孩子进行教育,聘请一对一家教,甚至是在线教育,这些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也为在家上学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和保障,让有条件的家庭为孩子选择在家上学成为可能。

无论在家上学也好,去学校上学也罢,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和方式是每个家庭的选择。诚然,在家上学可以施展个性化教育,弥补现行体制的不足,但是,在放大个性化教育的同时,孩子是否又失去了必要的集体意识的教育呢?因此,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长期性的过程,万不可偏废其一。

宋华

房价绝非是被“扭曲购房观”推高的

一项面对5917名重庆居民的在线调查显示,86%的人认为,时下年轻人购房观扭曲现象普遍,“以是否有房、房子大小等标准判断一个人是否成功”是居首的“扭曲购房观”,其次是“房子成婚烟重要基础”。有评论指出,年轻人购房观扭曲是持续推高房价的重要力量之一(8月26日《重庆晨报》)。

在一个乡土观念、家园意识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国家,“房子”是根深蒂固的一个图腾,代表着家的守护感、营造着爱的安全感;它也是一个复杂的“程序”,寄寓着人们对生活的归属感与梦想。譬如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工作几十年才在“非一线城市”买到房子,买房前写过一首诗,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大意是,浮生过半,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愧对子女。不管怎么说,死也要买房盖房的,历史上,不在少数。及至清朝,有一首竹枝词还唱道:“搭得天棚如许阔,不知债负几多钱?”

中国人想要自己的房子,也算是个无可厚非的传统观念。我作为购房观扭曲的意愿,应该是这样的:譬如一下子买了很多房子,故意让别人没房子住;又譬如买了房子不是自己住,而是用来点把火烧烤玩的……不然,只是想有个安身立命之处,怎么就叫“观念扭曲”?空置率不“扭曲”、保障房不到位也不“扭曲”,独独年轻人想要有套房子就扭曲了,这是什么逻辑呢?

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以房论成败”,这并不是多可耻的事情。在一个健康公正的社会秩序中,钱赚得多一点、房子住得好一点,当然令人艳羡,这也是能力的体现。如果市场经济都基于承认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那么,非要“自虐”才能证明观念纯洁?二是“年轻人的购房观”是个伪概念。市场上的房子,大多未必是被年轻人买走的,再说,他们对房子的种种观念,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果说“以房子论成败”就是购房观扭曲,那么,“中年人的购房观”、“老年人的购房观”就不扭曲了吗?

房价是被年轻人的“购房观”带坏的——这样的逻辑,就像当年的“丈母娘助推房价”一样,自然不需要正儿八经的辩驳。但这些天方夜谭的背后,却扎扎实实反映了某种无奈的焦虑。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7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分别为62个和57个,权威媒体表示楼市10年调控了43次,而房价上涨了10倍。房价既没有顺应政策,也没有顺应民意。

不说楼市泡沫,只说年轻人的购房观;不谈实体经济,只谈年轻人的就业观。这种分析法则,无非是把经济问题意识化,仿佛冥思苦想,就真能铁树开花。中国经济社会的解题,不能如此游戏化。

邓海建

人大代表吃“软钉子”的背后

日前,广州的人大代表接待日,政府的职能部门,照例回答代表们提出的众所关心的问题。当市人大代表陈彦文质疑,去年广州的罚没收入24.5亿元,其中交通罚没达8亿元,占到1/3,这8亿元罚款的去向一直没有公布,尤其是相关部门有无分成问题,应该给出解释。对此,市交警负责人回应,非税收入的8个亿和交警没有关系,交警是报账单位,非税收入全交给财政局。

警方给陈彦文的答复是“机智”的,陈彦文算是吃了颗“软钉子”。从1997年开始,广东就在全省统一要求公安部门对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所有罚款须先上缴地方财政部门,再通过年度预算方式拨款支出,返还的做法属于违规。换言之,陈彦文关于交通罚没收入去向的问题,应当问财政,理论上与交警直接关系不大。就算交警每年的花销里,来源上从这笔钱来的成分,但因这其中的“无限制增长”的“漂白”,交警或其他部门,有没有因交通罚没的“年度增长”而有所间接“得利”,在合适的公开制度未建立之前,是令公众颇费猜疑的。

从财政管理理论看,罚没收入比税收具有更明显的强制性和无偿性,与税收相比,罚没收入缺乏固定性,对取得财政收入缺乏稳定可靠的保证。但是,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对罚没收入的“强制性”更感兴趣,并将其不稳定性中的“无限增长可能”,看做是“提高收入”的基础。然而,在公众看来,既然罚没收入的来源是强制和无偿的,那就是地方政府的“无本买卖”,依照“无约束来源应给予硬约束”的管理原则,对罚没收入的使用盯紧政府的钱袋子,这恰是阳光财政必须彻底公开的一部分。从人大代表陈彦文的质询可以看出,去年广州的罚没收入24.5亿元的款项,是“来得明白去得不明白”,所以,陈代表以罚没收入大头的交通罚没款为由进行质询,是非常有道理的。

事实上很多人大代表认为,财政部门只有建立统一账户对罚没收入实行统收统支,并及时向公众公开这笔资金的使用途径,才是遏制罚款腐败和乱罚乱扣行为的有效办法。而目前的现状是做到了罚没收入的统收统支,但是,印象中还没有真正做到彻底公开使用途径。所以,只要每年的罚没收入的去途去向一天没有公开,公众和人大代表的猜疑和质询就会永远持续下去。

唐螂

“清华方案”:经济理性过甚 人文关怀欠缺

关于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清华方案”,近日在全国引起了公众的密切关注。“清华方案”的好处,是跨越了“双轨制”——“并轨”的政策思路上的陷阱,避免养老金制度改革可能被这个一因一果的线性思维所裹挟,从而设计了一个既考虑公平又考虑效率的因而可持续的改革方案。然而,遗憾的是其中的第五点,即“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普遍反弹,这不能不说是方案中的一个明显的瑕疵。

于是,便有媒体采访了“清华方案”的设计团队,并以“延迟领养老金非延迟退休”为题进行了报道。如果死抠概念,“领取养老金”和“退休”当然是两回事。但是,对于大多数退休后再养老金将是维持生活唯一经济来源的劳动者,“领取养老金”和“退休”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再者,在中国,这样的劳动者又有多少呢?

上述报道中以美国为例,说明了劳动者是可以先退休,然后过几年再领联邦养老金的。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是,美国有一个401K的补充养老金计划。按清华团队的说法,美国人59.5岁退休,65岁领取联邦养老金,其间的空白,可以由401K来填补。但是,有资料表明,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三支柱”计划,除了联邦公共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之外,还有私人养老金,即企业养老金(401K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IRA计划);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宣布一个养老金改革的计划,从1983年到2017年,在35年中,逐步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延迟到67岁。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计划实施时,401K和IRA这两个计划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所以可以“填补空白”。

如今“清华方案”提出,“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问题在于,这些被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女性职工和居民,他们的401K或IRA在哪里?其实,这种不讲理的政策有点像“协保”——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其特点是“不管当前生活,只管退休养老”,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女性职工有相当一部分正在享受这种“待遇”。现在眼看退休年龄将到,要“苦出头”了,然而政策又

要变了,退休后又有一年不能领取养老金。这实际上是要将“协保”的年限延长,当然,最后几年的“性质”变了——“退休”了,却没有养老金。

平心而论,“清华方案”中提出“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其价值理念仍然表现出经济理性过甚,人文关怀欠缺。在方案的操作层面上,他们以“保险精算”画地为牢,把“多收、少发”作为出发点,把2~3个人养1个老人看成是一种绝对的危机。其实,在不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随着老龄化的进程,这种状况迟早要出现。

这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因为社会保障教科书上早就告诉我们,如果只考虑企业缴费和个人缴费,现收现付制会难以维持。靠延迟退休年龄节约的养老金基金其实很有限,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但却会使大多数劳动者遭受损失。就社会心理而言,可预期的养老金制度所起到的稳定人心进而稳定社会的作用,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刚性”原则,切不可掉以轻心。

如果突破只考虑“收多少、发多少”的“保险精算模式”的束缚,把养老保险看成是社会分配的一部分,我们的思路就会开

阔得多。其实,决定社会养老机制的关键有二:其一是这个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有多大规模,其二是这些物质财富将会怎样分配。企业缴费和个人缴费可以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筹资手段,但除此之外,还有财政补贴、国资提成等手段可用。

如果我们再打开思路,改变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自有其积极意义。民间传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从现在到2035年还有22年,我们规定的劳动年龄又是16岁或18岁,所以我们完全有时间改变2035年时的人口结构。计划生育并不等于“少生”,在人口出生率低于自然更替水平时,鼓励“多生”恐怕也是一种“计划”。但“多生”也要有其物质基础,现在年轻人的生育计划中,母亲何时退休是一个必要条件。

在中国公共服务很不完善的前提下,50岁退休的老人帮子女带孩子,尤其是0~3岁的孩子,同样是一种社会贡献,能否把他们的微薄养老金看成一种抚养下一代必要的“社会工资”。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低,与没有老人带孩子的习惯相关。

所以现行退休年龄的好处也是该好好想想的。如果打破这种已经形成的“平衡”,其后果实在难以预料。唐螂